

401

2206.7
Z63

小识斋雨苦

止庵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雨斋识小/止庵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3

ISBN 7-5060-1580-3

I. 苦… II. 止… III. 周作人-文学研究 IV. I206.6

苦雨斋识小

KUYUZHAI SHIXIAO

止庵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36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580-3/I·83 定价:19.00 元

序 I

5	欧洲文学史	44	儿童文学小论
9	艺术与生活	48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3	过去的生命	53	看云集
17	自己的园地	57	知堂文集
22	雨天的书	62	周作人书信
27	泽泻集	67	苦雨斋序跋文
31	谈龙集	71	夜读抄
35	谈虎集	76	苦茶随笔
39	永日集	81	苦竹杂记

目 录

85	风雨谈	128	立春以前	173	外编
89	瓜豆集	132	过去的工作	175	乙酉文编考
94	秉烛谈	137	知堂乙酉文编	182	老虎桥杂诗与知堂杂诗抄
98	秉烛后谈	142	老虎桥杂诗	195	一本书的传奇
102	药味集	147	鲁迅的故家	213	希腊神话二三事
107	药堂语录	152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222	苦雨斋译丛跋
112	书房一角	157	鲁迅的青年时代		
117	药堂杂文	161	木片集	249	后记
122	苦口甘口	166	知堂回想录		

序

我读周作人的著作，始于十五年前，对建立自己的散文美学观念有大用处，此外也关乎思想问题，不过这里不想谈论自己，所以不提。然而关于别人——我指的是周作人——我也未必就有很多话要说。这个话题既涉及文，又涉及人，老实讲我对后一方面了解得不够充分，有些事情的起因还不明白，所以过去没有议论，现在也还不能议论。他的文章则通读几遍，连同集外文在内；然而迄今为止，都还只是为的整理出版他的译著连带说几句闲话。专门写文章，好比正经搞研究，我目前尚没有这个本事。

从前我说：“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先得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将近十年来，自己所花的一点工夫就在这儿。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把周氏亲手编的各种集子重新校订一过；一是把他的译著凡是能够找到手稿的，都依照原来样子出版，——据我所知，五十年代以来出的那些，被删改得太厉害了。其余日记、书信、集外文等，自有他人收集整理，我只当个读者就是了。这里前一件叫“周作人自编文集”，已经做完，其中《知堂回想录》系据作者手稿复印件整理，订正印本错漏删改之处数以千计，自以为颇有意义；又《老虎桥杂诗》选择谷林抄本为底本，也不无特殊价值。后一件叫“苦雨斋译丛”，才完成了一部分，具体工作都是请译者家属做的，已出版之九册十种，除《财神·希腊拟曲》外均依原稿印行，而《希腊神

话》还是未刊之作，这都是值得一提的。如果说由此提供了一套可靠版本，今后研究者可以利用，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今后如有机会，还想把这件事继续干下去，特别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选》有待重新出版。我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学习写作，跟文学打交道已近三十年，其间重新校订《知堂回想录》，首次出版周译《希腊神话》，以及首次出版废名著《阿赖耶识论》，也不能说是徒劳无功了罢。

这么讲话可能过于冠冕堂皇，其实我张罗出版这些书，也有很实在的个人目的，就是希望敝书柜里能摆上一套，自己读着方便。我只是个普通读者，这里也不例外。当然整理过程本身就是在阅读，有的时候（如前述《希腊神话》、《知堂回想录》和《老虎桥杂诗》）还是“先睹为快”。至于最早出版的《周作人晚期散文选》，乃是练习之作，编选功夫最为不济，不过我编这书时自己动手抄了十几万字（其余是母亲代抄的），得以细细体会周氏行文习惯，也是一种收获。

相比之下，我所发议论的分量就要差得远了，虽然原本并没有议论很多。从前为编选的《周作人晚期散文选》、《关于鲁迅》写过后记，为校订的《艺术与生活》写过前言，两辑“苦雨斋译丛”也都作有总序，分别编进拙著《如面谈》和《六丑笔记》中，这里不再重复收录。去年整理“周作人自编文集”，把他韵文章反复看过，随时有些零碎感想，春节前后偶有机缘，以书为题，写得三十六篇小文，编成这本小册子。文章都很简短，也缺乏系统。不妨一并说一句：在我看来，周作人作为这些书的作者，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这是三位一

体、互相关联的，而其毕生工作，又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鉴别批判最为重要；他的创作生涯，共总可以分为三期，分别以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为界限，以这里所谈及的各书（并不完全依照出版顺序）而论，则《欧洲文学史》起为前期，《夜读抄》起为中期，《老虎桥杂诗》起为晚期，各期自有特色，以个人口味论，最喜欢的是中期之作。现在所能讲的就是这些，以后倘有心得，再来报告。此外有几篇近似考据之作，讨论若干零碎问题，兹列为外编，附在后面。

书编得了，还要取个名字，好像叫什么“书话”最容易了，但我素不喜欢这说法，觉得乃是出于后人杜撰；知堂翁称作“读书录”，或“看书偶记”，倒更为贴切。不过我想也不妨题为《苦雨斋书话》——不是“苦雨斋”的“书话”，那早已有人汇编出版了；而是关于“苦雨斋书”的“话”，乃是我所写的，也就是说，不是“书话”，是“书”的“话”。朋友说这略有捣乱的意思，就放弃了。末了想起《论语·子张》里子贡说的“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遂取名《苦雨斋识小》。我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不贤者，然而不贤者能识其小，不亦有些贤乎。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五日

欧洲文学史

歐洲文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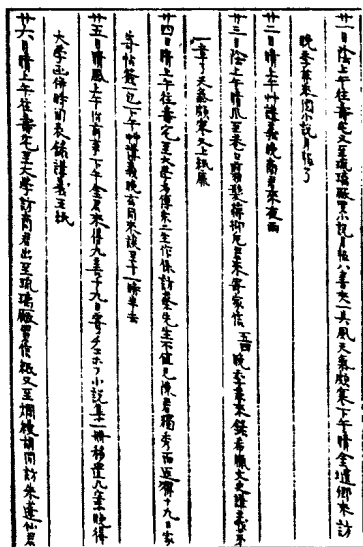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叢書之三

周作人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月再版本。原书目录七页，正文各卷分别题为“欧洲文学史第一卷”、“欧洲文学史第二卷”、“欧洲文学史第三卷”，均单独编码，计第一卷六十九页，第二卷六十一页，第三卷八十页，后附勘误表一页。

《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一七年九月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欧洲文学史》即为当时授课讲义。作者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中说：“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查周氏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云：“上午草讲义。”是为第一卷写作开始。九月二十四日云：“下午草讲义。”是为第三卷写作开始。第二卷则起手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晚起草罗马文学史。”全书完成于该年六月七日：“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这是周作人来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

多年以后，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是：“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算是“编译”。在周氏日记和同期的购书目录中，可以找到部分



周作人日记中有关撰写《欧洲文学史》的记载

参考书的记录。书中未必完全没有作者自己的体会。例如谈及海罗达斯所著拟曲时说：“第一章之媒媼，第三章之塾师，皆跃跃有生气，虽相去二千余年，而读其文者，乃觉今古人情相去不远。”撰写《欧洲文学史》之前一年，作者即已将此两篇译为中文，所写前言有云：“今译二篇，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媼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

初不相远，所可笑也。”乃是同一说法。虽然威伯来评论海罗达斯也讲过类似的话（见《看云集·古希腊拟曲》），但他并非专就上述两篇而言。

今天来看《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与他此前十余年间的大量译述工作正相一致，而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们）当中则显得特别突出。作者后来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是重要基础之一。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后来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此书之中。他并将译介古希腊文学作为毕生事业，所

翻译出版的几种作品，此书均有详细介绍。

此外《知堂回想录》说：“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似乎只是枝节问题，却关系到他对于西方（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基本看法之一。以后他明确提出“名从主人”，即根源于此，曾经为此写过多篇文章。而本书命运，说来也与作者这一立场不无关系：“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中间只得少陪了。”周氏谈到西方文化时一再讲：“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苦竹杂记·北大的支路》）大概就是这里说的“主旨”罢。由此亦可得知，这本《欧洲文学史》并不完全，还有一部分（大概当列为第三卷的第三篇）写好未能印行，现已亡失。

二〇〇一年二月六日

艺 术 与 生 活



上海群益书社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版本。原书自序六页，目录三页，正文四百八十六页。

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本。原书自序四页，目录三页，正文四百八十六页。

《艺术与生活》一九三一年二月由上海群益书社初版印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列为“现代文学丛刊”之一重新出版。一九三〇年作者所作《自序二》（此文中华版未收）有云：“这是四年前所编，”查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日记，二月二十二日云：“下午整理旧稿。”二十三日云：“上午寄群益函，又稿一部分。”即此书是也。其中所收计一九一八年五篇，一九一九年五篇，一九二〇年五篇，一九二一年一篇，一九二二年一篇，一九二三年一篇，一九二四年以后三篇（《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国语文学谈》和译作《论左拉》）。

《自序》中称，《艺术与生活》“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以文体论，则如作者所说：“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与其别种著作，包括同为文艺批评的《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都不相同。而“态度也比较地正经”，正是论文与随笔的根本区别所在。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着眼于“艺术”与“生活”；而“艺术”又包括内容和形式，后一方面，如《勃来克的诗》之强调象征，《日本的诗歌》等之介绍小诗，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是极具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前一方面，其实说的也是“生活”，——与五四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周作人当时也将文学视为影响改变社会与人生的手段。这里最要紧的一篇是《人的文学》，其他



周作人印章二枚

文章都可视为对它的补充发挥。关于《人的文学》，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这一“中心观念”除了通过“艺术”诉诸“生活”之外，本身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周氏基于“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的认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他一开始就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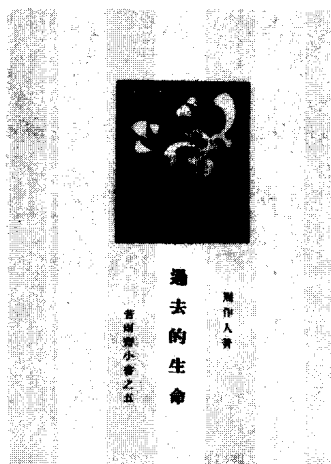
“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确认“人间”与“个人”的相互联系，不偏居其中任何一极，最终所关心的是“人间”每一“个人”，乃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所在。有关“生活”是这本书的另一重要部分，作者从上述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直接关注社会，所着力宣传的是日本的新村运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艺术与生活》所反映的主要还是那一时期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的面貌。如同《自序》所提示的，一九二四年以后周氏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更对此多所反思：“在这个时期，

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文学与宗教》）又说：“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小河与新村下》）《艺术与生活》的部分内容，与其后来的“定论”已经不无距离。说来对人的本质认识是一回事，对这一认识得以变为现实所抱定的信心又是一回事，所谓《访日本新村记》的“幼稚”，《人的文学》的“浪漫”，都仅仅指后一方面而言，而现在他将二者区别开来了。周氏从此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对新村运动的热情固然早已冷却，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也不复宣扬，人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仍然是其思想核心所在。不仅《人的文学》的基本原则不曾放弃，《艺术与生活》一书由这一原则出发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等，此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与生活》奠定了周作人一生全部作品的思想基础。

二〇〇一年二月七日

过去的生命



上海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版本。原书序四页，目录五页，正文一百二十八页。